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陈忠实 李继凯



【第二十九册】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 延安作家（五）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二十九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 陈忠实 李继凯

#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 延安作家（五）

李继凯 翟二猛 宋颖慧等 / 编著



## 天 蓝



### 传 略

天蓝(1911—1984),本名王名衡,又名王若海,笔名天蓝、白木次郎,江西南昌人。现代诗人,翻译家。

天蓝于1911年8月10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少年时在南昌王家村读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远中学上初中,这时开始发表旧体诗。1929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中学理科,组织黄蔷薇社。1930年春,因反法西斯被开除,随后转入上海光华中学,读书期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协助编辑学生会刊。1932年天蓝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后转到哲学系读书。1934年发表第一首新诗《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苍蝇投水自杀》,署名白木次郎。1935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赴北平转到燕京大学读书,并毕业于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在燕京大学,他课余写诗作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多在《光明》《大公报》文艺版、《燕大周刊》的《诗刊》上发表,均署名天蓝,天蓝成为他最主要的笔名。

1935年,天蓝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北平作协会员,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参加北平作协的成立大会并是大会的四个记录员之一,主编北平左联机关刊物之一《联合文学》。作为燕京大学学生,天蓝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任十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一。1936年春,他还参与成立大学艺文社,并任大学艺文社出版的综合性文学社会科学期刊《大学文艺》主编。

天蓝于1937年春由北平转赴山西,在临汾加入八路军,经人介绍,至黄河八路军防区,并奔赴延安,曾任山西八路军总部秘书,以及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任翻译组长,《前线》助理编辑。1938年天蓝到达延安,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长。先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学员,后任教于延安鲁艺,是文学系的名著选读教员,兼任文学编译科科长。这时期,他还曾组织文学团体“路社”,编辑墙报《路》,并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的翻译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天蓝主办部队文艺青年训练班。1944年他曾

同吕骥、艾青、贺绿汀等人去南泥湾体验生活。

在延安时期天蓝以自己的学识和经历，给予七月派诗人胡征以有益的理论指导和艺术分析，给胡征讲黑格尔、罗素、亚里士多德、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风。他和公木在鲁艺曾经长期共事，彼此相知很深。在延安“整风”期间，天蓝曾被怀疑是托派，也受到批判。

1945年，天蓝作为东北文工团（后改名为东北文工一团）成员奔赴东北，曾任黑龙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团长。1946年春，他参与筹办《东北工人报》，并任社长，未及出刊，该刊便因部队撤退停办。1947年出任东北《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文章。天蓝还曾主编过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曾任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长，本溪煤铁公司铁矿部部长。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席、《工人日报》主编。1952年调北京中央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天蓝1956年时在北京马列学院工作，受“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的牵连，接受审查。在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中他亦未幸免被审查，并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职。后来1966年“文革”中又被下放至山西省保德县山村务农。

“文革”结束后，天蓝于1978年被平反，调至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任副所长，从事文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和译作工作。后于1982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这期间，天蓝也写过几首旧体诗和两首自由体短章，但在生命的晚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了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上。

天蓝自称“是一个动手动脑搞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只是一名业余诗人”。他曾出版过《预言》《队长骑马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天蓝诗选》四部诗集，代表性的诗作有《G. F. 木刻工作者》《夜，守望在山岗上》《队长骑马去了》《开荒》《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等。作为现代诗人之外，天蓝还是翻译过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名著的翻译家，主要的译著有：达·芬奇《美学笔记》、亚里士多德《诗学》，以及《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演剧教程》和《共产党宣言》注释等。此外，他曾与安波、韩塞、冼星海、王震之等合作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歌曲《九一八大合唱》《开荒》等，还写了很多歌词，如《识字种地》《团结抗战》《红五月工人歌》《东北人民自卫军歌》《士兵歌》等。

1984年4月13日，天蓝逝世。



《天蓝诗选》书影



## 《队长骑马去了》(长诗)



《队长骑马去了》书影

《队长骑马去了》是天蓝于1938年5月创作的一首叙事长诗，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此诗的创作源起于天蓝听闻的抗战游击队队长王凤泰的传奇故事，是为纪念这位牺牲的游击队长而作。这首诗时代气息强烈，以游击队员作为视角，全诗选取了三个主要场景，即队长到来后的整编、教育，整顿以后的战斗、胜利，失去队长后的惨败，塑造了骑马的队长的高大形象，抒写了英雄队长为奸人所害的惨痛悲剧，表达了对队长的深切怀念，还有对破坏抗战祸国殃民的罪恶的愤怒控诉。全诗感情激越，悲怆沉痛，意境开阔，形象鲜明，画面生动。

此诗运用口语，语言精短质朴，音节铿锵，适合朗诵。这首明白晓畅的叙事诗，可谓慷慨悲歌，有极强的感染力，是解放区长篇叙事诗的先声。

这首诗多短句，契合当时延安开展的诗朗诵运动，传唱一时，取得轰动效应。后来也流传到国统区，在多个刊物刊出，很快被国民党查禁，但其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在当时对很多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 《夜，守望在山岗上》(诗歌)

《夜，守望在山岗上》写于1938年4月的山西抗战前线，其时，天蓝正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任秘书。这首诗是抗战初期的优秀诗篇，其主要内容是写“我”在山岗上站岗放哨时的所见所思，形象鲜明突兀，富有深层意蕴，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善于捕捉直感和深层意识活动。诗题开宗明义，点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一开篇就写成“守望”的情态，以“我”之眼写所“守望”之外部空间，后转入写“我”的所思，抒写“我”置身于祖国的群山河流，心怀为冤死的同胞复仇的正义决心，表达了自身的博大胸怀和爱国情感，吐露抗战卫国者的心声。然后又由叙写“我”之心理思绪，转入实处，“我握住枪，停住朔风，守望住这山岗……”画面变得充实具体，很好地回应了诗题，对全诗起着收束作用，并且突出战士的高大形象。结尾以“——敌人从正面侧面来，在四五里以外……”渲染了当时的战斗气氛。此诗很形象地抓住了激战前夕寂静的瞬间，勾画出战士钢铁般的矫健形象：挺风握枪，守护在山岗。

这首自由体小诗，写得短小精悍又惊警有力，在艺术手法上较多接受外来诗歌的影响，有明显的现代气息。诗歌语言很富有特色，与中国传统诗歌语言殊为不同，



有较明显的欧化倾向,诗人将诗句拆成短行,甚至是单字,使用倒装句式,以及跨句成行等语言策略,使得全诗的思想感情表达具有较强的浓缩性,力度感突出,并形成诗歌鲜明的雕塑感,既使读者受到情感激荡,又使得读者感受到较强的视觉冲击。

《夜,守望在山岗上》是战歌也是赞歌,在抗战初期,不负其鼓动国人坚决投入抗战,守卫住祖国河山的使命。



## 《天蓝诗选》后记<sup>①</sup>

天 蓝

我念私塾小学的时候,开始写旧体诗。1926年上初中,开始发表旧体诗。“四人帮”祸国以来,我又曾用文言文的掩眼法,写些旧体诗抒发愤懑。但旧体诗毕竟是过时的形式,这里不录。

在大学年代,我是外国文学系的学生,自不免受世界近代文学的影响。不过这时我已自觉地参加救亡运动和社会革命斗争。所以这里所选的抗战前的四首诗,形式上不太好理解,缺点是明显的;但也不是不能理解,它的长处似乎是能够更自由地更细微地表达内心复杂的感受。内容是对旧社会的控诉。

等到1937年冬,我直接和工农兵生活在一起,同生死共命运的时候,诗的语言自然而然地变得比较明白易懂了。

一般说来,没有深深的情感激动,我是不写诗的。可是我写的大部分歌词却是为了那时的政治需要写的。虽不能说没有诗的成分,但不多。这里不录。《青年的歌》和《我们的连队英勇而年轻》也曾谱成曲子歌唱过,但我本来就是把它们作为抒情诗来写的,所以又选在这集子里。

我一生写诗不多,可选的更少。这里我应该提一提,不是周游同志的具体帮助,这集子还到不了这样子。就此感谢他。

1980年4月

<sup>①</sup>天蓝:《天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86页。



## 天蓝同志其人其诗<sup>①</sup>

降大任

天蓝，本名王名衡，江西南昌人。少年在原籍南昌王家村读私塾，后在上海光华中学读书，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均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而转学。毕业于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成为左联成员、七月流派著名诗人。

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任十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一，曾任《大学文艺》主编。1937年春，经中共北平市委某负责人介绍，至黄河八路军防区，由一位罗将军介绍赴延安，曾任山西八路军总部秘书、翻译，延安军委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长，1943年任教于延安鲁艺，兼任文学编译科科长、文学系党支部书记。1945年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领导人之一率队前往，曾任黑龙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长。1947年任东北《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文章，1949年任东北煤矿工会副主席。1952年调中央高级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1955年“反胡风”时受牵连，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职。1966年“文革”中下放保德县山村务农，1978年平反，调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负责人，从事文学美学等学科研究和译作；1982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病逝，诗作有《队长骑马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天蓝诗选》等。译著有达·芬奇《美学笔记》、亚里士多德《诗学》以及《马恩列斯论文艺》《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戏剧教程》等，又有《共产党宣言》注释及报刊文章多篇。曾用笔名：白木次郎、若海、天蓝等。

从上述天蓝的简历中，可以看出这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走过的艰难曲折人生道路及其全身心投入民族大众解放事业的贡献。正如他诗中表白的：“我不能擅有我/我不能属于我个人/我属于被人鞭打的祖国呵/我属于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如果了解到天蓝在受打击受迫害时期，在山村里曾过着辛勤耕作而温饱不继、妻儿啼饥号寒的赤贫生活，也有因人生绝望企图自了解脱被妻子苦劝而顽强生存下来的境遇，以及在此境遇下仍点燃窑洞的小油灯精读马恩，苦心研究译述的坚毅和韧性，我们对他实践自己誓言的苦熬精神将怎样地受感动。天蓝亲口对我讲：“尽管我曾被开除党籍，但我心中从来不承认这种处分，我始终自认是共产党人。我不能背弃对真理的信仰。”天蓝的一生可谓抱有崇高理念，无限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

<sup>①</sup>降大任：《天蓝同志其人其诗》，《黄河》，2004年第8期。

同天蓝结识以来,我是将他当作心仪的恩师和人生的导师的,但他不允许我以老师称呼他,只让我称他同志。天蓝,以他的思想和人格感染着我,对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具有巨大的根本性的影响。今天,我成为一名文史研究者,如果说做出过一点成绩,那主要是拜天蓝同志之所赐。

天蓝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年了。每一回想,他那圆圆的淳朴的苍颜,那时而剧烈咳嗽的身态,我都禁不住痛苦、难过。我原初并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与他相识在1975年,我初调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参与一份少年儿童刊物,而天蓝则与陈仲平、段世贤(若非)同志在政治读物编辑室搞《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原著的注释工作。天蓝健谈,一来二去便十分惯熟了。渐渐地,我知道天蓝有多方面的才干,他精通马恩学说,能读德文原著,在文艺学、哲学、美学方面造诣甚深。他同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高鲁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老相识,天蓝有一本早年的旧著要送给我,因先由高鲁同志拿去读,就未能如愿至今(这真是一件憾事)。1977年我奉调西藏日报社工作,与天蓝分别。在1975年5月至1982年7月间,我同天蓝交往频繁,并书信不断,可谓无话不谈,过从甚密。这段时间内,我从天蓝那里对马克思学说进一步有了新理解。我十分惊异天蓝对马恩学说的精熟程度,同时也才知道他早年在延安就是一位名诗人,他的代表作《队长骑马去了》曾传诵一时,诗人同马恩理论家这两种身份,在我看来很不协调。诗人不免天真浪漫,理论家则思维缜密、思索深邃、逻辑很强,二者何以能集于一身呢?相处日久,我发现天蓝恰是这样的人,真是太奇怪了。慢慢地,更多地知道了天蓝上述的坎坷经历,逐步理解了这位诗人是怎样经过血与火的锤炼,终于成为一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仰者的。在天蓝身上,我感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那种对理想信念无限忠诚、坚毅执着的品格,那种不以名利萦怀,时刻忧国忧民的云水襟怀。他是那样纯粹、高尚,又是那样纯朴、率真,使我为之心服、令我崇敬不已。就天蓝对我的理论启蒙而言,他讲的“马学”(马克思主义)绝不是通常教条式的说法,使我有全新之感。比如读原著,他推崇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和《资本论》;是他第一次向我指出“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有误,他郑重地说,这词的本义应是“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权利,只是形式上有旧社会的痕迹而已。这就与当时的流行论点唱反调;是他向我讲解马克思反对“个人崇拜”的篇章,并联系以往革命历程的曲折加以剖析;是他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内涵做出符合马恩本义的解释;他还回忆投身革命的往事,指出“极左”路线的长期危害。这些言论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使我深受震撼。“文革”结束后,天蓝兴高采烈,以巨大的热情投入科研工作。他特别称扬在胡耀邦等英明的中央领导下,感到一种重生之幸。然而,天不假年,肆虐的病魔夺去了他手中的笔,戕害了他的生命,他未竟的事业只好由我们后继者来完成了。

读天蓝的诗,如读其人,好像手中捏着一把火。他的诗最大的特点:一是具有饱满的热情、郁愤、怒火或欢乐、喜悦,都像火山喷发出来,绝没有无病呻吟之词,而是如擂鼓的重槌敲击人心,使你一下子掉进感情的氛围。这是赤裸裸的情感流露,像遭遇巨大的冲



击力,产生感染和共鸣,使你无法不受震撼。二是天蓝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没有华而不实的浮词虚语,简短而有力,节奏感强烈,充满阳刚之气,如他推崇的伟大诗人惠特曼一样,具有崇高的人道情怀和磅礴气势,这是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崇高共产主义品格的反映。由于语言的天然韵律和节奏鲜明,所以有许多首均曾谱曲、传唱,发挥了其革命时代鼓舞斗志的作用。三是艺术手法极富独创性,语言形式不仅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且早已有意识地有机地融入了现代诗象征、隐喻等特色。像那首《队长骑马去了》的名作,以极简练的语言写成叙事短章,高度精练而充满张力,从沉痛哀思中迸发出无限的激情,毫无消极悲观的意味,有的是一团火一样焦灼的企盼和昂扬的斗志,这在新诗创作历程中大概只有田间早期的作品是差可比拟的。也许天蓝的诗被我们淡忘得太久(这与他遭受不公正的命运有关),但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阳光毕竟为今后的人们所急需,天蓝的诗是不朽的。天蓝不以诗人自许,但历史将证明天蓝不愧为杰出诗人,他的诗是中国新诗发展中一座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硕果之一。

### “七月诗派”的江西籍诗人:天蓝和芦甸<sup>①</sup>(节选)

颜 敏

《七月》杂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最有特色也最有力度的文学刊物,它吸引、汇集和培养了一批出色的诗人,以致形成一个力量厚实、风格独特的“七月诗派”。在这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中,活跃着两位江西籍诗人:天蓝和芦甸。

天蓝,原名王名衡,又名王若海,曾用笔名白木,江西南昌人。1926年在南昌心远中学上初中时开始发表旧体诗。1932年发表第一首新诗《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苍蝇投水自杀》,同年考入浙江大学。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开除,转入燕京大学外文系学习。1935年天蓝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编北平左联机关刊物《联合文学》与北平大学生进步文艺刊物《大学文艺》,创作发表了不少自由体诗歌。

1937年天蓝奔赴延安,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翻译及《前线》助理编辑,承受了战火的洗礼。在山西前线,他“被一种生活战斗的欲望驱使着”,创作了一批表现抗战生活的诗作(胡风:《四年读诗小记》)。调回延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火线通讯社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天蓝满怀幸福的感受和坚定的信念,抒写延安这块光明土地上的新生活。解放战争时他在烽火弥漫的东北,曾主编过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及《东北工人报》。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席。1952年调北京中央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强烈地摇撼着诗人的心灵,他欢欣地抒写了一系列赞美和祝福的诗歌。同时还有一些“为了那时的政

<sup>①</sup>原载于《宜春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治需要”写的诗和歌词，它们“虽不能说没有诗的成分，但不多”（天蓝：《天蓝诗选》后记）。

天蓝的厄运自50年代中期开始，1956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牵连，次年又被错划右派。1958年调往山西省委党校任教，翻译了一些外国文艺论著，发表过报告文学和散文。“文革”期间，再次受冲击和迫害，生活坎坷，“曾用文言文的掩眼法，写些旧体诗抒发愤懑”（天蓝：《天蓝诗选·后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天蓝出版过四本诗集：《预言》（1942年5月桂林，希望出版社）、《队长骑马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均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出版）、《天蓝诗选》（198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天蓝的诗歌创作，波动起伏地前行。这种变换的轨迹，无疑是诗人生活和思想感情变化的投影。抗战前，他先后在上海与北京求学，诗作主要揭示腐朽黑暗的社会，抒发对旧社会的满腔悲愤。如《给一个陈死人》，为纪念一个电影演员的死而作，对造致女演员沉沦并不可自拔而死亡的颓废、畸形的大都市，予以愤怒地谴责。

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命运面临危难，天蓝如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一样，投笔从戎奔赴延安，生活和创作出现了一片新景象。他身着戎装，随部队挺进敌后，在萧索的寒风中行军，于迷茫的雪夜里出击，写下不少激昂沉雄的诗篇。此时诗人，以刚健的主观精神投身于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中，审美的视点将个人与民族高度融合，基调雄浑激越。如写于1938年4月山西前线的《夜，守望在山岗上》：

我的眼控制着山群/我的心屏息着。

夜，淹没山外的山/山外的河流/夜，淹没溟濛的苍穹……

我盼望广阔无垠的祖国/有千万冤屈而死的人民/有十月不熄的大火灾……

我私誓，我愿/将我付与山西的西部/那五千年来繁荣的大地/于今被迫而荒瘠了！

我握住枪/挺着朔风/守望住这山岗……

——敌人从正面侧面来/在四五里以外。

诗歌抓住了激战前夕寂静的瞬间，凸现战士钢铸般的矫健形象：挺风握枪，守护在山岗。应该说，诗人的视点对准了生命力凝聚得最强最纯的焦点，因为战士置身于祖国的群山河流，心怀为冤死的同胞复仇的正义决心。

天蓝除了以充沛的激情抒发自身的战斗感受外，还热情地讴歌为民族而战为祖国捐躯的抗日英雄，《队长骑马去了》就是一首影响较大的叙事长诗，诗歌为纪念一位牺牲的游击队长而作。它以游击队员作为叙述视角，描述了队长如何制止了他们这群溃退士兵的脚步，把他们整编成一支具有觉悟性和战斗力的队伍，并率领他们周旋在敌后夺取一

个又一个胜利。由于队长被奸人诱过黄河遭谋害，队伍落入坏人手中，蒙受惨重损失。抚今追昔，幸存的游击队员更加怀念逝去的队长，深情而悲切地呼唤：“队长！/啊，回来！/我们/一千个心在想/一千双眼睛在望/你呀！/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以滚烫的激情，串起富有感召力的短促诗句。语言精短质朴，音节铿锵。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队长骑马去了》是解放区长篇叙事诗的先声。新诗以抒情见长，虽然新文学运动以来，诗坛上也有人做过可贵的尝试，如冯至写于1925年的《蚕马》，朱湘写于1926年的《王娇》等，都是成功的作品，但数量毕竟很少，而且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历史传奇，很少反映现实生活。现代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发展得最为充分的，还是三四十年代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创作，而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写于1938年5月，是根据地最早以叙事诗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之一。

回到延安后，天蓝的诗歌发生了新的变化。他的诗作渐渐洗去狼烟征尘，着重抒写延安这块光明土地上的新生活，抒发生活在明朗蓝天下的豪迈感受与坚定信念。《预言》（作于1941年1月）形象地表述了诗人融入集体后的充实感，以及走向太阳的坚定信念。一方面，诗人保留着“七月诗派”共有的不懈地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纯真理想，并以这种理想去拥抱生活：“太阳赋予热，赋予希望/热与希望赋予活力。”另一方面，诗人把这种向上的精神，坐落在具体而庞大的形而上学基座上。也就是说，诗人寻找到了确切的价值信仰，并坚信这种信仰具有本体性的意义：“人类/从古昔到如今/由散漫的个人/走成了集体的队伍/人们在队伍里获取更大的自由/人们在队伍里更认识了自己的亲人朋友/人们在队伍里生出来之前有的莫可抗拒的/爱憎/人们将在集体里活着呵，/活着如同人们自身亿万细胞互相适应的/机体。”诗人确信，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价值信仰体系，代表着历史的必然，世界的未来属于“我们”。同化于集体中的“我”，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力量。

完成了思想质变的诗人，以自豪的心情赞美“我们”的解放区，用欢欣的情感抒写“我们”的新生活，“红色的萝卜披着雾里的阳光/绚烂地投入实用世界的新生/我的心跃起/骤见土地和人间的原有的丰富和美。”并自信地宣谕这种新生的意义：“我哟/我已从市民社会的公民启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公民/将又走向社会主义的公民。”（《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单纯明朗的心境与流畅直白的语言和谐统一。不过，激情有余，诗味不足。新中国成立初期，天蓝的诗情又一次高涨。诗人以极其饱满的革命热忱和无比崇敬的激动心情，以极致的抒情笔调和鲜明质朴的语言，歌颂新崛起的人民共和国。他先后创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呵，我年轻而不可缺憾的祖国》《萌动——献给祖国诞生二周年纪念日》等抒情诗。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们属于祖国的颂歌。至此，天蓝似乎成为一位政治抒情诗作家。尽管从艺术的角度上讲，这些作品因为过于直露而显得浮泛，但是它们仍可以作为时代的见证和历史的标识，因为，诗人作为亲身参与并为之奋斗的历史见证人，面对翻天覆地的历史事件和划时代的伟大胜利，是以全部的主体的深挚情感去拥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简言之，这种真实而直露的情感，单纯而乐观的思想，正是时代的投影与折射。

综观天蓝的诗歌创作,可以发觉,他创作的真正高峰期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上述的几首诗可以作为其高峰期的代表作,它们深植厚重广袤的北方大地,回荡着充盈的青春激情,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七月诗派”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以主观拥抱客观的美学追求。诗歌中健拔高迈的主旋律,源自诗人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风浪中无畏搏击、在自我追求的道路上迅捷前行的真实感受。这些作品,总的看来,把具象性与抒情性、哲理性与政治性熔于一炉,富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艺术感染力。

同时也应看到,诗人在艺术成熟的过程中,就潜存着以政治热情覆盖艺术追求的因素。随着诗人思想情感的变迁,诗人日渐把个体融入群体,日渐以政治热情而不是属我性的主体精神切入现实生活,所以抒情性愈来愈政治化。尤其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诗人很快地被卷入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不得不停止歌唱,诗歌艺术的生命过早地萎谢,从而失去了冲击诗歌艺术高峰的现实条件。天蓝,没有达到他完全可能达到的诗歌艺术的高度!

## 创作及文学活动年表

1924年,在私塾读书期间,写作旧体诗《九头鸟之歌》。

1926年,在南昌心远中学读书期间写作发表旧体诗《西山扫墓》(五律二首)。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新文学创作。1932年,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两首旧体诗《游九溪十八洞》(七律二首)。

1934年1月1日,在《现代》月刊发表第一首新诗《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苍蝇投水自杀》。

1936年春,参与成立大学艺文社,并任大学艺文社出版的综合性文学社会科学期刊《大学文艺》主编。

1938年,写作《G. F. 木刻工作者》《夜,守望在山岗上》《队长骑马去了》《开荒》等诗作。

1939年,创作歌词《九一八大合唱》,诗歌《雪的海》《连枷歌》《抗战到底,要军民合作在一起》等。

1940年,写作《青年的歌》。与曹葆华合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由鲁迅艺术学院出版。

1941年,写作歌词《游击队胜利曲》,诗歌《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

1942年5月,诗集《预言》作为“七月诗丛”之一由希望社出版。写作歌词《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歌——“好日子”第二段》《克服困难迎接光明——“好日子”第四段》。

1945年春,在《解放日报》发表《三五九旅文艺调查》和《部队文艺一览》两文。

1953年,诗集《队长骑马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像太阳般升起》,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8年,在《哲学译丛》上发表译著《美学》,署名若海。

1981年3月,《天蓝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研究综述

天蓝是抗战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名诗人,是“七月派”诗人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有诗歌、歌词和与人合作的歌剧等。他的诗歌创作虽然量不算大,但别具个人特点,值得关注。目前针对天蓝生平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缺乏集中、全面和深入的探讨,还没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现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多为单篇文章,如回忆性评论文章、悼念散文、研究论文等。而且现有研究成果中对于天蓝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的一些史实性问题存有出入和争议,有待进一步厘清。

具体而言,对于天蓝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如下:

首先,主要是与天蓝有过接触并相识的作家、诗人等写作的忆悼评论文章,对天蓝的生平、文学活动及文学创作有所叙述和评价。钟惦斐的《忆天蓝》对天蓝创作的歌词《开荒》、天蓝出版墙报《路》发表华君武的漫画及天蓝晚年境况等进行了回忆。亦门的《诗的战略形势片论》回忆天蓝,说:“没有深深的激动,他一般是不写诗的。”牛汉的《诗人天蓝骑马远去了》一文指出,《队长骑马去了》是时代的哀歌,并带着沉痛的情绪,认为这首诗成为诗人天蓝的命运之曲。胡风在《悼念天蓝同志——作为他的诗集的代序》《〈七月诗丛〉介绍十一则》等文中,认为天蓝歌颂了战斗者的德行,“他为‘年轻而勇敢的人’歌唱了‘大时代冷峻的战斗’和战斗的‘冷峻’”。评价天蓝是“一个有特彩的诗人”。针对诗集《预言》,胡风这样评价:“作者是个特彩的诗人,他的热情是在战斗的思想里面锤了又锤、炼了又炼的,因为他歌颂的是在时代洪炉里面烧过了结晶了的人生。他的笔触带着铿然作响的锋利,他的风格好像是钢板上发着乌光的浮雕。”周良沛认为天蓝早期的诗可归入现代派,后来诗风转变,却仍然带有“现代”气味。他在《七月诗选·序》中评价《队长骑马去了》,认为此诗“是那黑暗的年月呼唤光明,是在反动的时代追求进步的声音,叙事又抒情,沉郁又喷薄,是诗人的力作。”散木的《天蓝和他的名作〈队长骑马去了〉》主要对天蓝《队长骑马去了》一诗的抗战历史背景中的“托派”问题进行解释,认为有了对于这一历史背景的了解,才能不误读天蓝此诗。唐天然的《〈队长骑马去了〉的诞生经过——天蓝同志一夕谈》细述了《队长骑马去了》一诗的诞生经过,较具史料价值。周游的《悼念天蓝同志》追忆了天蓝生平经历,表达了悼念之情。降大任的《天蓝同志其人其诗》对天蓝的生平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认为天蓝的诗具有饱满的情感,并且是纯粹的诗,简短而有力,节奏感强烈,具有阳刚之气,同时在艺术手法上具有独创性。并且认为“天蓝的诗是不朽的。天蓝不以诗人自许,但历史将证明天蓝不愧为杰出诗人,他的诗

是中国新诗发展中一座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硕果之一。”

其次,是将天蓝放置于七月诗派中对其创作加以论述。骆寒超在《论晋察冀·七月·九叶三诗派及其交错关系》中认为天蓝是以雄浑豪放的气概来本色地抒唱战争的。《队长骑马去了》和《夜,守望在山岗上》等诗都直接写出了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挫折、坚守岗位,奉献青春和生命,诗歌具有极强的力感,富于阳刚之美。文振庭的《试论“七月诗派”》中认为《队长骑马去了》是“悲愤的控诉,也是告警的呼号”。颜敏的《“七月诗派”的江西籍诗人:天蓝和芦甸》中叙述了天蓝的一些生平情况,并分析一些代表性诗作,进而论述天蓝诗歌创作的变化,认为天蓝抗战前的诗作主要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抒发对旧社会的满腔悲愤,而抗战期间的诗则主要抒发战斗感受,讴歌抗日英雄,基调雄浑激越。天蓝延安时期的诗作着重书写延安的新生活,抒发在新天地生活的豪迈感受与坚定信念。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诗作则是热情歌唱新中国。作者还认为天蓝的“诗歌艺术的生命过早地萎谢,从而失去了冲击诗歌艺术高峰的现实条件。天蓝,没有达到他完全可能达到的诗歌艺术的高度!”

周燕芬在其博士论文《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中认为天蓝“将汹涌着爱与痛的情感浪潮,融注在简明纯朴的叙述当中”,其诗具有独特的构思和表达方式,风格呈现出“天蓝的带血的宁静”。

第三,是对天蓝单篇诗作的赏析性评论,多见于各种鉴赏类型的现代诗选本和其他作家的文集,篇目主要集中在《队长骑马去了》《夜,守望在山岗上》《无题》等几首。罗洛分析《夜,守望在山岗上》,认为此诗始终保持刚劲的笔触和力度,情景交融,浑然凝成一个崇高的境界。曾卓认为《队长骑马去了》有浑厚的激情,他在《天蓝的两首短诗》一文中阐述《无题》表达了一个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夜,守望在山岗上》则描写了一个战士持枪在山岗上守望的形象和献身的决心,认为这两首短诗都不枝蔓,内涵开阔,直抒胸臆,甚至不借助想象和比喻,语言接近口语,精练、简洁,孕育着深挚的感情。同时明确指出天蓝的诗应在现代新诗史中得到应有的评价,在现代新诗选中也应得到应得的位置。

天蓝及其诗歌不仅对于考察七月派诗歌及抗战延安诗歌有其特定价值与意义,其诗歌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亦值得关注和探究,但目前已有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对其研究尚需大力深入拓展。

## 主要研究论著索引

### 一、专著、文集、史料

1. 亦门. 诗与现实(第二分册). 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
2. 骆寒超. 中国现代诗歌论.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3. 周游. 一·二九在未名湖畔.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4. 胡风. 胡风书话.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5. 胡风. 胡风全集(第5卷).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 曾卓. 听那美丽的笛声. 湖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
7. 牛汉. 梦游人说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 二、文章

1. 文振庭. 试论“七月诗派”. 新文学论丛,1983,(2).
2. 公刘. 《七色花》学习笔记. 艺谭,1984,(2).
3. 唐天然. 《队长骑马去了》的诞生经过——天蓝同志一夕谈. 新文学史料,1984,(3).
4. 钟惦棐. 忆天蓝. 人民文学,1984,(12).
5. 散木. 天蓝和他的名作《队长骑马去了》. 博览群书,2001,(3).
6. 周燕芬. 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2.
7. 降大任. 天蓝同志其人其诗. 黄河,2004,(8).

## 田 间

## 传略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县开城镇羊山人,著名诗人。1916年5月14日出生在羊山乡一个名叫童家墩的小村,自幼在农村生活,其祖辈务农,他的父亲是一个读过古书也较有文化基础的农民,通晓古典文学,在田间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开了私塾,延请塾师讲授《诗经》和唐诗,使得田间自幼受到古典文学熏陶,喜读《诗经》,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田间的父亲还买回了不少白话新书,如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的小说,田间也都一一阅读。田间曾先后在三家大村念小学,在无锡、南京等地念初中,在芜湖念高中。中学时期他爱好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同时也开始学写新诗。



田 间

1933年,田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1934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加入中国诗歌会,投身诗歌大众化运动。1935年,担任《每周诗歌》主编,创作并出版诗集《未明集》,并寄赠鲁迅先生一册求教。1936年,田间出版了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短诗集《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写农民反抗斗争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受到茅盾的好评。这两部书都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田间险遭逮捕。同年6月,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赞同使用、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同月,在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拥护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年,田间在《文学丛报》《夜莺》《现实文学》《生活知识》等左翼文学月刊发表《夜歌》《五月的夜》《饥饿》《在大连湾上岸》《北方》《给诗人》等诗作,在《夜莺》第1卷第4期发表了长诗《饥饿》(《中国农村的故事》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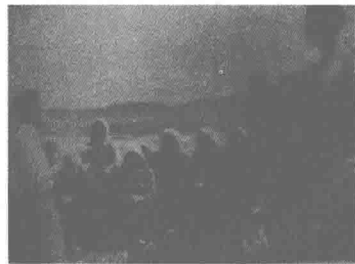
田间于1937年春到东京学习日文,较多地接触了裴多菲、拜伦、马雅可夫斯基等外国革命诗人的作品。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写出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战

斗诗篇,多收入诗集《给战斗者》(1943年)。这年秋天,田间去了武汉,写成《给战斗者》,该诗表达了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鼓舞了人民的战斗意志,是当时公认的优秀政治抒情诗。同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等诗集。年底,到八路军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战地记者。1938年时,田间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年春天,他随“西战团”到达延安,在延安与文艺界同人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创作了《义勇军》《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多一些》等大量的街头诗,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对鼓舞人民的斗志发挥了积极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随“西战团”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参加过百团大战。此后,一直到全国解放,田间都生活、工作在这里。

田间于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副主任,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同年在平山结识葛文。1943年起至新中国成立,历任孟平县抗联和县委宣传部长(1943年),冀晋边区《新群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5年),雁北地委宣传部长、秘书长(1946年),参加土改复查,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1948年)等职务。

从1943年来到晋察冀边区到新中国成立,田间一直从事地方党的工作,参加过从减租减息到最后一次复查的土地改革运动。现实生活的锻炼,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加之对民歌形式的借鉴,逐渐在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诗风,这一时期创作有《抗战诗抄》《短歌》《戎冠秀》和《赶车传》(第一部)等诗集,积极热情地反映解放区及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田间于1949年兼任察哈尔省文联主任,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创作部部长、文学研究室主任、《诗刊》编委等职。1951年,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兼研究员。并在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期间,任二分团秘书长。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后,田间任主任。这一年,他再次去朝鲜前线,以记者身份进入板门店谈判帐篷内,写成散文集《板门店纪事》。1954年田间



抗战期间田间  
在地头给农民讲诗歌

出访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1955年写作《欧游札记》。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田间相继访问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以创作表现当地人们的生活风貌和历史变迁。1956年,田间访问了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内蒙古,到内蒙古包头及黄河两岸等地,写出《马头琴歌集》一书。1957年他到云南访问,写有《芒市见闻》。1961年10月至11月间,他与严辰、张志民到新疆访问采风,11月2日在作协新疆分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乌鲁木齐地区的青年作者座谈了诗歌创作的问题,最后写成《天山诗草》。

1957年年底,田间曾到张家口市怀来县花园乡南水泉大队蹲点,创作街头诗、诗传单。1958年他兼任河北省文联主席。从这年起,他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去表现、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1964年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到开罗参加亚非